

胡风回忆录

胡 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风回忆录/胡风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 11

(新文学史料丛书)

ISBN 7-02-001705-3

I. 胡…

II. 胡…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②胡风-传记

IV. I251+K825.6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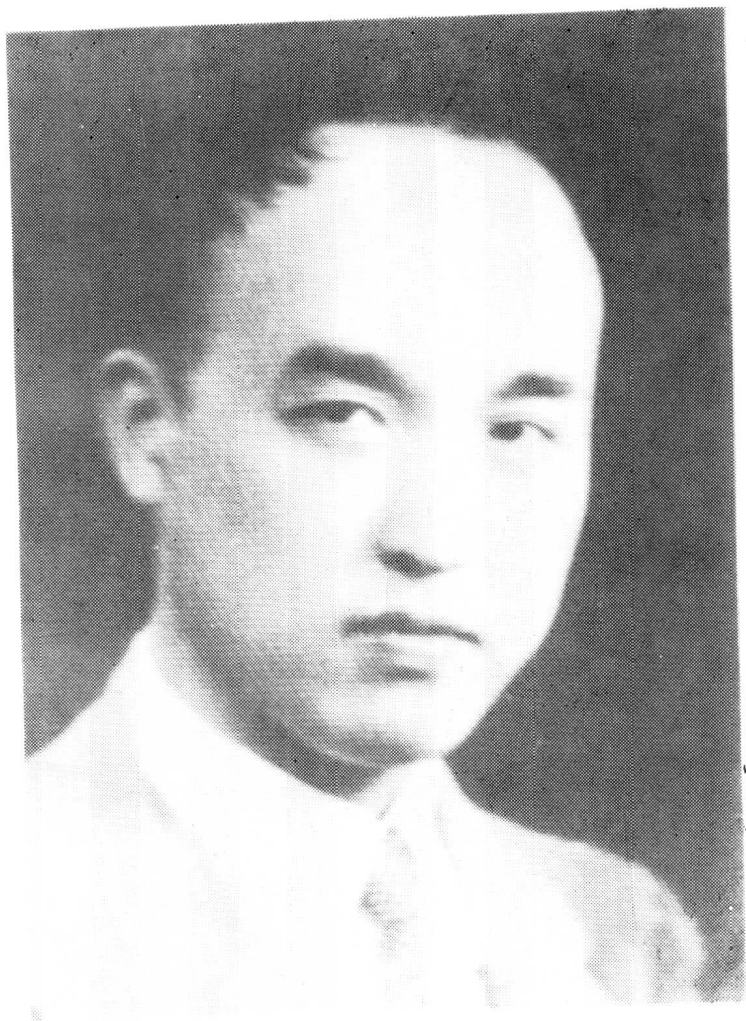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3.5625印张 4插页 311千字

199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50

定价 3.95 元



作 者 像

[illegible]

經點着筆下的悲痛。然而，在懂得修辭的
通律的某初四天也竟在親筆中，在每一句
有教給我的時候，因何刻刻不忘，把這林迷迷
着，然以居而竟先生的影子所着音，則哭聲其
不斷，就在那外流淚，然就升雲而而現，這我的重
思，竟能了我，使我不能動用，這我的說話，其
計這片損失的書，其

我像一隻牛，吃的是草，吐出的是牛奶。然
引用在友人梁寒士的提詞裏面，就變成是
以該悲壯地描寫了牠的乳汁的一生。不似楊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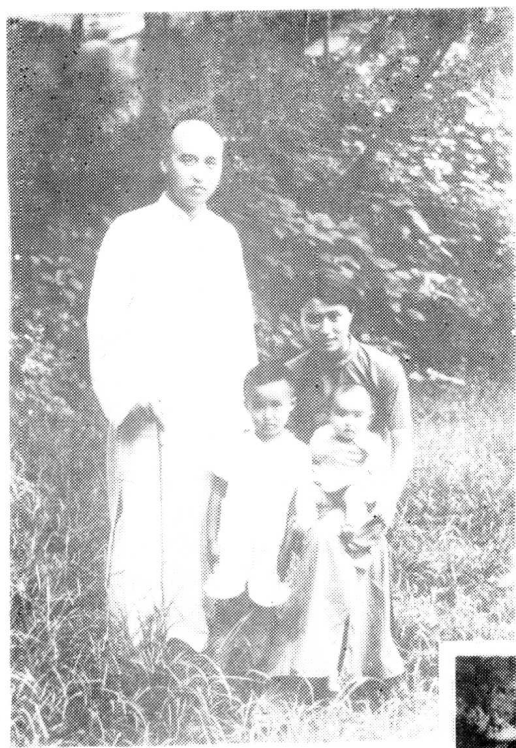
作者手迹



1932年3月
初摄于东京



1939年10月19日在重庆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上



1939年秋与梅志、晓谷、
晓风在重庆北碚。



1948年10月在杭州灵隐(自左至右)
前排：贾植芳、任敏、冀沅、胡风
后排：朱谷怀、余明英、路翎、罗洛

目 录

一 东京时期..... 1

偶遇秦德君——结识日本作家——郭沫若
从千叶来——左联东京支部——与上海左翼文
艺界人士接触：冯雪峰、丁玲、周扬——远东反
战会议——我们被捕了

二 在上海

上篇 左联任职期间..... 18

与鲁迅先生见面——周扬通知我做宣传部长——我对茅盾的看法——宣传部机构组成及成员介绍——关于《可爱的中国》——找个吃饭的职业：《时事类编》——冯雪峰常来谈话——《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穆木天被捕之后——与田汉的一次谈话——我为什么辞去左联职务

下篇 左联离职前后..... 33

补叙一件事——《林语堂论》——评介几位作家：禾金、欧阳山、艾芜等——《理想主义者时代的回忆》——译介台湾进步作家作品——《动向》上的两次论争——评介几位新人：耶林、田间、端木蕻良等——认识了“二萧”——《木

屑文丛》——《海燕》始末——《半夏小集》之五
与曹聚仁——我和《作家》及孟十还——参加长
征的冯雪峰回来了——“两个口号”论争——鲁
迅与党的负责人的一次谈话——“左联”解散了
——鲁迅逝世了——《七月》创刊

三 在武汉

上篇.....77

见到董老和周副主席——与国民党打交道
——阐述鲁迅思想——筹备《七月》正式出版
——木刻展览会——编辑《星期文艺》——茅盾
来了——鹿地夫妇——国民党对敌宣传委员会
——政治部第三厅

下篇.....92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姚蓬子与
《抗战文艺》——周作人附敌消息传来——《七
月》新作者：阿垅等——第一次公开发表《毛泽
东论鲁迅》——我与出版家俞鸿模——撤离武汉

四 重庆前期

上篇.....115

逃难生活——读书、读书——张静庐老板
——大侄张恩——艰难旅程中

下篇.....140

找到老舍——在复旦教书——《七月》复刊
困难重重——欧阳山与草明——周副主席约见
我——周扬带口信来——抗战慰劳团——吴奚

如的恋爱——丁玲的一包稿件——在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上——鲁黎的《延河散歌》——陶行知与育才学校——邻居马宗融、吕振羽——阿垅的《南京》——发现了路翎——高长虹来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编辑《民族形式讨论集》——吕荧《人的花朵》——去延安？去香港？——嘱托聂绀弩编《七月》

五 奔赴香港228

一路颠簸——访何家槐——孙钿来接——廖承志、夏衍来——送走M母子——与我有关的几家进步报刊——我去看望萧红——对夏衍的意见——香港工作总结

六 在东江，在桂林258

住满文化人的山寨——《死人复活的时候》——杨刚向我约稿——李亚群同志——熊子民像长兄——老聂与彭燕郊——骆宾基谈萧红——“保障作家权益会议”——南天出版社——与熊佛西的交往——记邵荃麟——M的童话诗——田汉约我看演出——乡下的祭神节

七 重返重庆

上篇291

遵义访老同学朱企霞——看朋友与“拜客”——潘公展的回访——《七月》的老友新朋——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荆有麟谈到鲁迅——

蒋介石的个别接见——雪峰已到此

下篇305

陶希圣其人——池田幸子的身世——《讲话》传到重庆——为鲁迅著作讨版税——看望卢鸿基——郭沫若的学术讲演——向林冰去三台——歌乐山见许寿裳——《财主的儿女们》——绿原来——《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与《约瑟夫的外套》——秦德君来信——捍卫鲁迅——骆剑冰的主意——舒芜《论主观》引起风波——《希望》大受欢迎——日本投降了——毛主席来重庆——老舍、曹禺赴美讲学——周公馆的饯行晚宴

八 重返上海

上篇355

看望许广平——俞老板的遭遇——贾植芳夫妇——二三故人——文化投资公司与《希望》——谒鲁迅墓——杨潮追悼会——看望内山——办事处、文协都来上海了——闻一多被刺——周扬来访——姚蓬子要印《鲁迅全集》——美国书商——纪念鲁迅——周颖出狱——《七月文丛》

下篇383

郭家的新年聚会——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周年——营救骆宾基——几个华侨青年——五四文艺节——关于《云雀》——雕塑家刘开渠——贾植芳夫妇被捕——修整鲁迅墓地——电

影《松花江上》——出书之难——香港在发动
批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内山书店的
王宝良——蒋家王朝覆灭前夕

附录 我的小传 420

编写后记 梅 志 426

一 东京时期

我是1929年9月和同学朱企霞一起去东京的。上船后遇见了秦德君，她是我在南京上中学时的教员穆济波的夫人，当时见过。1927年大革命时在武昌，我在他们夫妇租住的房子里借住过，1927年底到28年初又同在南昌。在船上见到后，知道她已离开了穆，这时和茅盾在京都同居。她这次回国是为茅盾讨版税，看朋友。她告诉我，茅盾看了我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的小说《三年》，觉得很好，她就向茅盾介绍了我的情况。船到长崎暂停时，茅盾从京都坐火车赶来上船接她。他们坐在甲板上谈话，我上甲板时遇见了，只是彼此望见点了点头，我没有上前去，也就没有谈话。好像是茅盾把她接上岸坐火车回京都去了。

我到了东京，小时同乡同学方翰(何定华)来车站接我到他寄宿的日本人家里。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就和朱企霞在本乡区租了一个姓前田的小职员楼上同住，马上到神田区东亚日语学校学日语。当时日本普罗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开展，不久，我就读起普罗文学的刊物来了。作品当然读不懂，但对那里面短小的工农通信（从工厂来，从农村来）感到很大的吸引力。那里写的无论是日常生活或基层斗争，都有真情实感，吸引了我。在国内读到的创造社的作品，几乎都是大而空的“意识形态”的表演，没有普通人民的感情；茅盾的作品有具体描写，但那形象是冷淡的，或者加点刺激性的色情，也没有普通人民的真情实

感的生活。这些通信的吸引力帮助了我学习日语，认识劳动人民。

东亚日语学校第一期是三个月，学完了就到本乡区一个名奥平定世的人和他的一个朋友办的补习学校进日语补习班。这个学校还有为日本人办的“支那语补习班”。和奥平认识了以后，他拉我为那个班教汉语。我就用工农通信作教材，帮助学生译成汉语，这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起了沟通感情的作用。奥平中国话说得不错，能读鲁迅的小说。这时他在横滨一个私立商业专门学校每周教两小时的汉语，他没有时间去，就让给了我。我也是用工农通信作教材，学校不过问。很可能，那个学校是日共设的一个据点。交谊继续了一年左右，以后没有时间再到他那里去了，回国后更没有再想到他。这两年，他开始给我写信联系。

在支那语班学习的，有一个帝大的学生，叫武安铁男。当是教材解除了他的顾虑，认识后请我到他的宿舍去玩。他给我看了日共党刊《党建设者》。我手边有华岗著的三卷本《中国大革命史》，就送给他看，并提议帮他译出来，他很高兴地同意了。除了借此他学中文我学日文外，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居然把这本厚书译完了。后来由我交给藤枝丈夫找地方出版，他却诡称被警察抄家时没收去了。现在如能找到原稿出版，那对日本革命运动还是有用的。

这时，得到了友人熊子民等在上海办的心弦书店（后改名昆仑书店）的通知，希望我翻译有日文译本的一本苏联小说。那是红色的幻想作品。内容是写美国革命工人派出一个工作队到苏联去，帮助苏联粉碎美帝国主义者破坏苏联革命的间谍活动。内容变化多端，人物能够在墙壁内穿进穿出。方翰认识一个叫做高津正道的日本人，他的夫人叫葵子，在二、三流的妇女刊物上

写点小文章。方翰介绍我从她学日文。我把那本小说当作课本，先自己读，读不懂的地方去问她，她给我解释，学完了以后就译了出来。原名叫《在彼得格勒的美国鬼子》，我简称为《洋鬼》，由昆仑书店出版了。译文当然不好，但读了它的熟人很感兴趣。

（这是假托一个美国作家写的，但据传说是几个苏联作家合写的，又说是布哈林写的，还有的说是斯大林写的。友人们看了感兴趣，不过是被那离奇的革命情节满足了对革命的向往和好奇心罢了。苏联还拍了电影，观众很欢迎；我的译本就是从电影片取来的几个画面作封面的。后来苏联解散“拉普”，组成作家协会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赤色的浪漫主义”的口号。提出赤色浪漫主义恐怕就是根据这篇小说和电影以及这一类作品的经验。但这种艺术效果对读者和观众只是一种兴奋剂，那还会导致读者和观众不愿正视历史实际以至脱离现实生活的严重副作用，和主观公式主义殊途同归的。所以，经过一两年的筹备，到作家协会成立时，就放弃了“赤色浪漫主义”这个补充口号，在会章上专提“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了。如后来的理论所说明的，文艺里面是一定有浪漫主义的，但浪漫主义是只能从现实主义产生，包含在现实主义里面的。这是批判地从人类文艺实践经验提升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

这本书的日译者是大竹博吉(笔名广尾猛)。因为译本中有些××和不懂的地方，就写信问他，他高兴地约去见了面，以后保持了一些时的交友关系。大竹是所谓“俄国通”，到苏联去过，回来后办了通讯社，并出版了《洋鬼》。后两年办了一个相当大的左翼书店纳乌卡社(科学社)，销售苏联书报并翻译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和苏联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还出版了日本普

罗作家同盟的刊物《普罗文学》。作为左倾文化人，影响不小。中国抗战初，报载他被捕，在警察署自杀了。据我在两个警察署呆过的情况，被拘留者是没有可能自杀的。很可能和小林一样，是被严刑逼供致死的。^①

当时，高尔基的长篇《四十年》第一部的日译本出版了，昆仑又提议我翻译。我写信给日译者大宅壮一，问他是不是有英译。大宅很快回了信，说愿意替我找英译本，并约我到他家去。他和日本普罗作家同盟委员长江口涣家相邻。我去他家后，他把我引到江口涣家去叙谈。他们很关心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学情况。《四十年》太大了，我不敢译，但因此却和江口涣等作家发生了友谊关系。江口涣，我去日本之前就读过鲁迅译的他的短篇小说《峡谷之夜》，人很朴实厚道。

一次，在他家里遇见了秋田雨雀。秋田是名作家，我不知他写了什么作品，只晓得他精通世界语，地位高，有世界文化人之称。谈话时他静坐着，常常闭上眼睛。1933年我回国后，那一年是他的六十岁生日，我写了《秋田雨雀印象记》，发表在当时刚创刊的《文学》上。

另一次，江口在他家召开了一次谈话会，要我介绍中国文学运动情况。出席的，除他和大宅壮一外，有声望极高的《蟹工船》的作者，普罗文联的负责人小林多喜二，和以“支那通”自命的藤枝丈夫等。谈话中，藤枝丈夫极力捧钱杏邨而抹杀鲁迅；我驳斥了他。这引起了在座者，尤其是小林多喜二的热切的共鸣。后来江口告诉我，藤枝是满洲浪人，抽鸦片（他老婆是医生，所以买得到）。散会后，小林和我一道出来，态度很恳切，约我到他家去，同坐了一段电车才分手。不久，他被迫潜入了地

① 本文发表后，一读者来信指出，大竹博吉当时并没死，后来还访问过新中国。——编者

下。在地下，他还写了中篇小说《地区的人们》，宣传党在地下组织工人的斗争，邮寄到大刊物《改造》上发表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激起了警察动员追踪他。1933年2月，他被捕受审时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当即受到严刑拷问，夜里就暴亡了。这消息引起了大的震动，普罗文化战线和先进工人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斗争。领导这个斗争的文联党组负责人池田寿夫避到我的住处借住了一夜。他提议我用中国左翼文总的名义写一个向日本政府抗议，吊唁的电文，我想了一想，同意了他。这电报发表在《普罗文化》上面。池田家离我的住处不远，我也到他家去过；他是靠他的夫人做广告“姑娘”维持生活的。

（关于小林多喜二的牺牲和池田寿夫的斗争情况，我抒写在《时间开始了》的《英雄谱》——原题《安魂曲》里了。）

以上，都是私人的进步的革命友谊联系。

另一方面，我想取得一个学籍的合法身份，弄到一名官费。第一个是东京帝大研究院，但我只有清华大学英文系二年级的资格，学历差得太远。找了他们的英文科主任市河三喜，他允许我到英文文学研究室去借书看，我去看了研究室秘书曾根保，他态度也很好。我又想进私立早稻田大学的俄文科。科主任冈泽秀虎很高兴，说不懂俄文不要紧，进来了再学好了。还把在俄文科毕业的宫本显治（当时已是日共干部）的得到《改造》杂志奖金的论文《败北的文学》（评芥川龙之介的）从《改造》杂志上剪下来送给了我。但我参加考试时，被文学部主任拒绝了。我又另想办法，托清华同学高琦找北大的教授钱稻荪写信介绍我去见庆应大学历史教授桥本，桥本转介绍我见英文科老教授畑。畑教授很热心，允许我进英文科当正式生，后来还替我交涉领到了庚子赔款的半费，每月四十五圆。

取得庆应大学学籍是在1931年春。当年暑假回国了一次，想

从湖北教育厅领到一名官费。到了上海，住在友人石民家里。石民是去日本前在上海认识的，他专攻英国文学，在北新书局当编辑。我到日本后曾为他编的《北新》半月刊寄过稿，如《夕阳之歌》和日本作家生田春月自杀的报道（生田是一个进步的名作家，思想倾向共产主义，但觉得在实践上不能贯彻自己的理想，无法克服这个矛盾，因而自杀了）。到武昌后住在友人金宗武家里。他是1927年认识的，当时他写了几篇小说在报上发表，还和一个姓蔡的开一个中央吃茶店。他曾留学过日本，同情共产主义，很可能是隐蔽的共产党员。这时好像是在李书城做厅长的建设厅当职员（李书城是老共产党人李汉俊的弟或兄，同情共产党，解放后当了第一任的农业部长）。我经常到住在汉口的友人熊子民家里去走动。熊是大革命后逃到上海时认识的，开办昆仑书店；这时又回到了汉口。我因大革命时在本县参加革命，做过打倒土豪劣绅的工作，担心他们报复，没有回乡去，但约大哥张名山到武汉来见了面。我去找了教育厅长王世杰联系官费，当然不成功。当时我想都没有想到通过李书城这类人事关系去达到目的。住了些时，就离开了武汉。

归途上，路过南京，住在友人韩起家里。韩起是1927年我在南昌编《野火》（后受到恐吓改名《长天》）时认识的，他好像投过稿，因而找来认识了。这时他和夫人董曼尼住在南京，和在什么军事机关做职员的这时已很有文名的张天翼熟悉。这时，他们（还有在上海的欧阳山，当时笔名罗西）共同出一个小刊物《幼稚》。我因他认识了张天翼，有两三个晚上交谈关于文学界的感想到夜深。记得一点：当时有一个新作家穆时英很出风头，有一篇小说写丝厂女工人的手指骨都露了出来。我们都很反感（后来听说这个人投了日本，被国民党的特务暗杀了）。在南京时，还遇见了同学高琦和他的夫人熊力珊，一同游了中山陵，和他